

創傷與創造：

台灣的文化糾結與中華文化的重構

何乏筆

一、漢學研究與批判理論

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從1899到1924年在中國生活了將近二十五年，1925年成立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的前身「中國研究所」，同年出版具有回憶錄性質的《中國的靈魂》。此書詳細和深刻地描繪他親自參與觀察中國歷史前所未有的文化變局，尤其思考辛亥革命後中國教育制度所面臨的艱難任務：如何調和中國與西方兩個龐大知識系統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將此書獻給曾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的蔡元培。但除了與蔡元培關係特別密切之外，他在民國初年也與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經營了寬闊的交流網絡，建立了德語漢學研究與現當代漢語學術之間的歷史橋樑。

衛禮賢強烈地意識到，對中國的研究不得忽視中華文化在19、20世紀所面臨的危機，亦不得忽視現代化的巨大壓力所造成的文化斷裂。問題是，儘管衛禮賢對清末民初的文化歷史困境有深入的體會，但在進行大量中國經典文本的翻譯和解釋的過程中，他仍然預設著中華文化連續不斷的「靈魂」，是不受文化歷史衝擊的影響而

永恆存在的。他親身經歷過、描寫過中國歷史前所未有的變動，然而他討論「中國哲學」的著作，卻對文化斷裂的哲學意義缺乏自覺。中華文化的歷史連續性與現代中國的斷裂經驗這兩條線索依然停留在切割分裂的狀態：超歷史的文化一統與文化的重創仍舊無法溝通。

難以否認的是，強加在中國身上的外部現代化引發了強大的「西化」趨勢，並造成了文化解構之後，一切有關「中華文化」的話語都必須面對重構工作的曲折。換言之，任何的文化復興或復古運動必定充滿所處時代的當代性，只能以當代的眼光來看古代，因此不得不對自身談論文化歷史資源的動機以及先決條件有所自覺。於是，筆者所謂「中華文化的重構」特別著重文化斷裂與文化連續性的複雜關係。為了加強對文化斷裂之哲學意義的自覺，筆者建議在文化斷裂與文化連續性之間加入「批判」的因素，以強調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帝王秩序之後，對中華文化的重構工作應該是一種「批判性的重構」。因為「批判」涉及對文化歷史資源的評斷和選擇性的重估，某些學者以「規範性的重構」取代之。如是，筆者想在衛禮賢所打開的漢學視野之外，另加入一種與法蘭克福緊密相關的思想資源，即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

在台灣如何談中華文化的問題，脫離不了東亞不同區域(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現代化過程之間的緊密交織和猛烈競爭。無論東亞不同現代化進路如何推展，都以「混雜現代化」為特質，都是交織了來自西方的外部現代化與內部現代化(即得以現代化的文化歷史條件)的線索。在歐洲地區，尤其是德國曲折殘酷的現代化歷程與東亞現代化歷程具有許多呼應之處，值得深思。因此，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德意志文化」甚至「歐洲文化」的批判性重構，是筆者思考應如何在台灣談中華文化的重要參照。

在20世紀的中國現代化中，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的對比，

導致對傳統文化前所未有的破壞。然而現代化等同於西化的現代化架構，可以被批評或許也可以被超越，但不可能消磨其深層的影響力。中國經歷西方帝國主義的創傷經驗，不僅造成君主專制的斷裂和民主化的開始，也啟動了以文化大革命為災難性標誌的現代化動力。中華民國的成立、五四運動對傳統的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性摧毀，這一連串的斷裂經驗，使得對中華文化的談論不能閃躲文化斷裂的事實。

從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反省納粹主義所造成的文化斷裂情形，初步看到德國經驗對反省東亞現代化過程的參考價值（這方面，本文的焦點不在於德國面對歷史罪過是否做得比日本好）。儘管希特勒政府及「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黨）掌權時間只有十三年之短，但確實使得德意志民族的歷史分裂為三個部分：1933年之前的歷史、納粹德國的歷史和1945年之後的歷史。這十三年所造成的歷史災難不僅引起了必須重構德意志文化，也引起了重新探討歐洲文化、思想史的強烈動機。哲學家阿多諾曾尖銳地指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所代表的文化斷裂之後（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以不可否認的方式證明了文化的失敗」），必須重寫歐洲文化的歷史。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中解釋荷馬的史詩《奧德賽》，初步落實這樣的批判性重構，亦即回到古希臘文化的重要開端來擺脫歷史災難所造成的失語狀態。納粹德國要對抗甚至打敗英美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企圖徹底失敗後，出現斷裂和連續錯綜複雜的辯證關係（情況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顯然更為複雜）：納粹德國的戰敗和破壞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產生顯著的斷裂，但批判理論學者在戰後一再批評納粹主義的連續性，要求斷裂的徹底落實（此要求在1968年學運中獲得廣泛的迴響）。1949年德國分裂為自由民主的西德與社會主義的東德，而兩種發展方向都以接續威瑪共

和國（1918年成立）的正面遺產為目標（一者要連續民主憲政，另一者要完成威瑪時期被打壓的共產主義使命），同時要從其失敗中獲取歷史教訓，一方面要與1918年之前的德意志帝國切割，另一方面又要和一黨專制的第三帝國產生斷裂。儘管東、西德統一（1990年）之後，許多聲音主張應要與德國歷史的關係「正常化」，但納粹德國所呈現的文化歷史斷裂，仍然是不可迴避的歷史環節。筆者將試圖以上述的歷史視野為參照，粗略反省現代化歷程在台灣所造成的文化糾結。

二、文化斷裂與混雜現代化

東亞現代化是因為「外部現代化」而開始啟動。西方帝國主義在19世紀以暴力的方式侵入東亞，促成深層的文化轉型（包含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眾所周知，日本在甲午戰爭的勝利強化了中、日在回應外部現代化挑戰的競爭關係，而此猛烈競爭到21世紀的今天從未停止（台灣在20世紀的歷史顯然脫離不了中、日不同現代化歷程錯綜複雜的關係）。然而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看，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不僅涉及不同的西化過程，也涉及內部現代化的問題：何種文化歷史的可能性條件影響了而繼續影響著不同現代化的進行方式及其成敗？在過去，這類問題經常是針對歐洲現代化的可能性條件而被提出的（為什麼科學、民主、資本主義等因素能在歐洲開始發展？），因為某種強大的現代性話語一再主張，歐洲的現代化必定是非歐美現代化歷程的規範性模型。顯而易見的是，東亞、南亞、中東、非洲、南美洲等地區，因不同的文化歷史條件，導致對外部現代化的挑戰而產生不同的因應方式，因此「多樣現代化」的角度，使得現代化的討論從西方現代性的標準轉移到內部現代化的因素。

例如說：在面臨現代化的挑戰時，許多學者曾主張儒家即等同於中國現代化的障礙，但近二、三十年來，儒家思想的研究確實突破了傳統／現代的死板框架，因而逐漸以儒家思想作為內部現代化的重要資源。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外部現代化的暴力侵入使得中國掉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兩次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共產革命）對文化造成巨大衝擊和破壞。尤其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與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密不可分。難以否認，隨著兩次政治革命，中華文化經歷了兩次文化斷裂：第一次是「帝制文化」與「民國文化」之間的斷裂，第二次是「民國文化」與「共產文化」之間的斷裂（毛澤東以文化大革命為國共內戰的延續）。隨著中華民國遷台，民國的學術、文化人才和機構開始大規模地融入甲午戰爭以來深受日本統治影響的台灣地區。由此觀之，台灣在現代化過程中也發生了兩次文化斷裂：第一次是滿清帝制文化與日本文化之間的斷裂，第二次則是日治時期的混雜文化與民國文化之間的斷裂。換言之，台灣文化糾結的結構性問題之一在於：前日治時期在台灣所發展的中華文化（其在日治時期並沒有消失）與特別是在1949年後來自大陸的民國文化，在光復後的台灣無法順利銜接。相反的，國民政府對台灣菁英階層的破壞，以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中華文化的意識型態化，反而引起了深層的「反中」情結（無論是針對中華民國的「中」或中共的「中」）。

因此，在台灣談中華文化問題時，不得不回到文化銜接為何失敗的問題（參閱林俊臣文章的相關討論）。更尖銳地來說，倘若要在台灣談中華文化而不反思清理上述多種文化斷裂的問題，中華文化在台灣很難成為創造性轉化的共通資源。假如不能面對文化斷裂所造成的慘痛經驗甚至創傷，文化創造便停滯在流行文化的快速操作之中，無法以深層的歷史積累為文化資源。假如在今天要展開中華

文化的重構，實不得忽視，斷裂經驗的反思清理乃是重構工作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便是中國大陸，要談論中華文化的復興，亦免不了要思考民國文化與共產文化之間的斷裂問題。綜上所述，讓人憂心的是，直至今日，在台灣化解反中情結的基礎工作（即相關的學術和文化工作）仍然難以深化和突破；在大陸，對民國文化與共產文化之關係的關注（所謂「民國熱」）則處處面臨政治阻礙。到底該如何走出困境？

三、民國文化與漢文化在台灣

在台灣談中華文化涉及如何走出糾結、開闢創造性轉化的問題。依筆者淺見，一個重要突破點在於重新探討民國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並重新評估民國文化對台灣的意義。就此楊儒賓曾指出：「因為經由血淚證成的創造性轉化，中國與東亞不必然再是台灣外部的打壓力量，它們反而是台灣內部創造力的泉源。」¹換言之，在台灣談中華文化必須放寬視野，必須正視民國文化所帶來的文化資源（面對民國文化與共產文化的斷裂），同時也要正視民國文化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所累積的文化遺產（面對民國文化與帝制文化的斷裂）。於是，在台灣談中華文化的問題首先是指在台灣應如何談民國文化的問題²。

簡言之，民國文化的重要啓示在於既能強調與帝制文化的斷裂，承認現代化的革命性轉折，又能主張中華文化可經由對帝制文

1 楊儒賓，〈一九四九的禮讚〉，《思想》，第12期，頁85。

2 參閱楊儒賓主編，《人文百年 化成天下：中華民國百年人文傳承大展》，新竹：國立清華大學，2011。

化的批判來加以重構。這必然是艱難的掙扎過程，但難以否認，這種斷裂與連續的複雜辯證，從一開始就比共產文化盲目打破傳統的做法更為高明，甚至是中華文化繼續現代化（亦即不倒退到帝制文化）唯一可行之道。捨棄民國文化之現代化模式的後果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已清楚浮現：經由共產文化對民國文化的全盤否定和殘暴摧毀，從共產文化直接倒推到帝制文化，陷入帝制文化的帝國夢已是日漸顯著的趨勢（此乃歷史辯證的莫大諷刺）。對民國文化而言，抵擋此一趨勢是極為重要，亦可說是關鍵的任務。為了因應共產文化與帝制文化聯手的危機，構想出既不是倒退到帝制文化又不被化約為共產文化的中華文化，反思兩階段的民國文化（1949以前及1949至今）及其得失頗為重要。在共產文化面臨嚴重正當性危機，而復興（帝制）文化的渴望興起之際，藉由民國文化正面遺產來重構中華文化，不僅是關係到大陸的文化前途，也與台灣的文化前景緊密相關。直言之，假如台灣的文化藝術界在文化創造方面因為「反中」的狹窄視野，而不能充分接納民國文化（及其對中華文化的重構），台灣便很難在文化方面與中國大陸抗衡。倘若台灣本土意識以排除民國文化為建構文化認同的途徑，因而排除經由中華文化而走向世界，台灣在思想和藝術創作上將面臨文化資源的嚴重枯竭。

從民國文化的角度談中華文化意味著對混雜現代化的積極態度：承認現代的中華文化必定是一種多元的文化，是一種混融許多外來文化資源的混雜文化。民國文化之所以為現代，即是因為展現出高度的學習和轉化能力。不可否認，五四前後的民國文化在這方面的成就雖然可觀，但也相當有限，等待後世學者的延續推進。回顧民國文化在重構中華文化方面所下的功夫是值得的，因為帶動這些努力是將文化斷裂轉化為文化創造的使命，是串聯外部現代化的強大動力與內部現代化之豐富資源的想望。顯而易見，1949年以前

民國時期之文化人的思想和藝術活動是在極其困苦的時代背景下生成，但為民國文化醞釀出了值得連續的面向：（一）中華文化與帝制文化的切割（只有在辛亥革命被承認為必要的文化斷裂之後，1911年以前的文化遺產方能發生創造性轉化，展開現代化脈絡下的孕育力，以能靈活地運用中國內部現代化的文化歷史資源）；（二）中華文化重新面對東亞，尤其是日本的發展（百日維新失敗後，許多支持改革的學者逃往日本，參考日本的現代化經驗）；（三）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中如何定位（當時尤其是中國，印度和西方的關係受到關注，因而文化創造早已開闢跨文化視野）。

從上述角度可初步確定的是，民國文化可視為台灣學界和文化界開闊視野、走向世界不可或缺的環節。可是，在本土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對峙下，台灣的文化創造力面臨難以擺脫的阻礙。即便籠統的中華文化、日本文化、西方文化和原住民文化的交織構成了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多元面貌，台灣學界和文化界能否走出文化糾結的決定性因素，仍舊是對中華文化的態度和評價。或者更精確地來說：對1949年後的民國文化所營造的中華文化形象的態度和評價。在此情況下，台灣文化創造性的重要發展條件有賴於「中華文化」話語的去意識型態化和去民族主義化。蔣介石曾經診斷，國共戰爭遭受慘敗的理由之一在於「沒有哲學基礎」，因此決定以三民主義哲學為對治毛澤東思想的「中心思想」。然而結果卻是造成三民主義意識型態化，使得無數的台灣學生對三民主義哲學產生怨懟，反致損害了孫中山的思想遺產³。換言之，作為政治和思想運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三民主義哲學」，遮蔽了民國文化對中華文

3 參閱林從一，〈哲學101：開新局、展新頁〉，收入楊儒賓主編，《人文百年 化成天下：中華民國百年人文傳承大展》，頁212。

化的批判性重構之貢獻。近幾年來，台灣學界才逐漸擴大解蔽的工作，開始重估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

擺脫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依賴的政治對立（即民國文化與共產文化的對立）之後，方能重估1949年以前在台灣所發展的中華文化。或說，為了避免混淆，可將台灣本土的中華文化線索稱之為台灣的「漢(字)文化」（筆者以此簡稱楊儒賓文章所謂的「漢字—漢語—漢文化」）。一旦從民國文化與台灣漢文化的區別來看台灣的文化糾結，就可理解漢文化是台灣本土文化的主要構成因素，即使在日治時期，其影響也從未切斷過。由此觀之，在台灣談中華文化之時，要走出台灣文化糾結的重要步驟，在於民國文化與台灣漢文化之關係的釐清與轉化。必須釐清和轉化的是兩種文化斷裂：（一）民國文化的內部斷裂：民國文化包含後帝制文化的多元性、開放性和跨文化潛能，因此民國文化對中華文化的重構從未停留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給出的僵化和同一化形象（中華文化話語的去意識型態化和去民族主義化，便能將中華文化的批判性重構再向前推進）；（二）一旦能在中華文化批判性重構的基礎上，重新串聯1949年前後的民國文化（楊儒賓在這方面已下了極大功夫），串聯民國文化與台灣漢文化的途徑便敞開（參見林俊臣的文章）。綜上所述，假使在台灣談中華文化以擺脫台灣的文化糾結、開闢文化創造性為目標，這兩種面對文化斷裂，並且進行重新串聯和銜接的工作，顯得特別重要。

衛禮賢曾經在《中國的靈魂》中描繪了民國初年的學者知識分子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機時，如何在斷裂與連續之間尋找出路。在民國初期，除了全盤西化、徹底反傳統的要求外，出現了各種大體上承認混雜現代化的學說。這些學說以不同方式試圖藉由歷史文化資源的重構，實現內部現代化與外部現代化線索的交織。然而，東亞各地的現代化在意識型態和民族主義要求純正的支配下，

繼續茫然徘徊在極端化的趨勢之中。因為如此，在台灣談中華文化，以走出文化糾結，不僅對台灣有意義，對東亞文化發展有意義，甚至具有世界普遍意義，因為涉及對現代化的另類思考，涉及混雜現代化的普遍性問題。

何乏筆 Fabian Heubel，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中文、德文及法文著作多種，研究領域包括跨文化研究、當代漢語哲學、批判理論、西方漢學、藝術哲學。